

一代霸才張謇(三)

王成聖

攝政召見最後建言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張謇五十一歲，他曾一度遊歷日本，考察實業、教育，返國後即陸續創辦了呂四塩業公司、漁業公司、大達輪船、輪步公司等。與辦實業、提倡教育相繼有成。張謇便和他的三哥張謇通力合作，實行他的村落主義，積極推動南通地方自治。他曾親自規劃南通全縣水利，終使南通一地水災消失而水利大興。又興築全縣公路，使境內鄉鎮，四通八達，可通行汽車者計達五百餘華里，此外又設置長途電話，加強全縣警力，在各鄉鎮分別成立保衛團，至於醫院、圖書館、博物院、氣象台、公園、貧民工廠、養老院、殘廢院、育嬰堂、盲啞學校、伶工學社、更俗劇場等等公共福利設施，亦莫不迅告完成。當年英籍中國通李提摩太曾有一針見血之論：「中國除非真能實行普及教育、公共衛生、振興實業、實行自治，始克富強。行之一二十年後，必可躋列一等國。能行二三事，亦不至於落入三等國之列，此比練海陸軍為強，但中國究竟有幾省能夠實行？」民國前後，全國十八行省，真能實行此四事者，唯南通一縣而已，因此，南通乃有全國模範縣之譽。

張謇在南通全力推行地方自治，他的基本觀念是：「國可亡而地方自治不可亡，國可弱而私人志氣不可弱！」正因為他抱定主張：「私人志氣不可弱」，他才能以個人的力量，創辦了這麼多的事業，建立了這麼大的事功。因此世人尊他為「中國的實業大王」。謔者戲稱他為「南通土皇帝」，至於張謇自己，他也曾作過豪語：「上而對於政府官廳，無一金之求助，下而對於社會人民，無一事之強同。對於世界先進各國，或師其意，或損其長，量力所能，審時所當，不自小而倏，不自大而誇。」

建設南通有成，張謇名滿天下。由於朝野的一致推崇，爭相延攬。他造福人羣的範圍漸次由南通擴及於江蘇、全國。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他代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魏光燾奏請清廷立憲，同年清廷降旨賞他三品銜，任為商部頭等顧問官。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他成立了預備立憲公會，自本身為清末立憲派巨擘。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江蘇諮議局成立，到會九十五人，張謇獲五十一票當選議長。旋即聯絡全國十四省諮議局，奏請清廷速開國會，實行君主立憲政制。

宣統三年(一九一三)張謇五十九歲，被廣東、上海、天津、漢口四地商會公推晉京，為中

國報聘美國事請願。宣統生父攝政王載灃曾經在勤政殿召見，和張謇相對而坐，請教國事，這是張謇最後一次向清廷建言，由他和載灃的對答之中可以規知清廷對他的重視，以及當時張謇的國事主張。攝政王載灃一開口便說：

「你十多年不到京，國事越來越艱難了！」

張謇語重心長的答道：

「臣自丁憂出京，已十四年。先帝(按指光緒)改革政治，始於戊戌，中更庚子，至於西狩回鑾。凡此都是先帝艱貞蒙難之日。如今世界皆知中國立憲，重視人民，這也是先帝之所賜。」

張謇意在提醒載灃，當務之急在於改革政治，實行憲政，希望載灃以攝政王之尊完成他胞兄光緒帝的未竟之志。可是載灃昏庸顛頂，他無從置答，祇好順口嘉獎張謇幾句。於是張謇又度慷慨陳詞：

「臣自馬關訂約，不勝憤恥！從此致力於實業、教育二事。後因國家新政，需人奉行，又專注於地方自治。這十四年裡雖不做官，但亦未嘗不辦事，此所以報先帝拔擢之知，如今國勢危急，極願攝政王周諮博訪，俾以求政治之進行。」

載灃祇好鼓勵他道：

「汝在外辦事多，閱歷亦不少，有話儘可說

張睿便條分縷析的直陳：

「當今外交有三大危險期。一、今年中俄伊犁條約。二、宣統五年英日同盟條約期滿。三、美洲巴拿馬運河告成，恐有變故。內政有三大重要事。一、外省災患迭見，民生困苦，朝廷須知民隱，諮議局是溝通上下，輔導行政之機關。二、商業困難，朝廷須設法振興，金融機關須靈活運用。三、中美人民須聯合一致。」

這一次，攝政王載灃的回答是：你所說的極是，可與澤公商量去。澤公，指的是載澤。張睿最後建言，依舊是不得要領而告退。從此以後，張睿對於清廷，可以說是全盤失望了。

當袁世凱的墊脚石

張睿和袁世凱之間的關係演變，應為民元前後史乘上頗為重要的一環。張、袁先為師生，後則一改而為同志、僚屬、政敵。正如袁世凱對張睿的稱呼，最初稱為老師，繼稱先生、齋翁、齋兄，張睿同樣的變化多端，令人發噱。無可否認，張睿曾應吳長慶之請教過袁世凱的書。其後吳長慶被李鴻章調往金州，袁世凱仍留朝鮮。他便見風使舵，改走李鴻章路線，以迄吳長慶憂憤病卒。袁世凱此一朝秦暮楚，背主求榮的行徑，是吳長慶幕中諸名士如張睿、張營、朱銘盤等人所最不能原諒的。因此早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即由張睿執筆，以二張一朱的名義，致函袁世凱，痛加斥責。這是張睿一生之中，唯一憤憤激動，尖刻犀利之作，由此亦可見張睿對袁世凱嫌

惡之切。由於函中不之當年秘辛，不失為我國近史上一頁重要資料，全文如后：

張睿與朱曼君及叔兄致袁慰亭函

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

「別後僅奉一書，因知司馬勞苦功高，日不暇給也，彼公內調金州，以東事付司馬，並舉副營而與之，竊想司馬讀書雖淺，更事雖少，而彼公以三代世交，肫然相信，由食客而委員，由委員而營務處，由營務處而營帶副營，首尾不過三載，今彼公處萬不得已之境，僅聚千五百人退守遼海，而以中東全局，為司馬立功名富貴之基，溯往念來，當必有感知遇之恩，深臨事之懼者，及先後見諸行事，及所行函牘，不禁驚疑駭笑，而為司馬悲恨於無窮也。司馬初來，能為激昂慷慨之談，且謙抑自下，頗知向學，以為是有造之士，此僕等貿然相交之始，迨司馬因銘盤一言之微，而得會辦營務處之號，委扎裁下。銜燈煌然，迎謁東廡，言行不掩，心已稍稍異之，然猶以少年氣盛，不耐職事，需以歲月，或有進境也，東事擾起，適際無人，睿遂與司馬偕行，彼時司馬意氣益張，然遇事尚能奮勵，不顧情面，節而取之，效猶足多，曾不意一旦反復，夸誕謬戾，至如今日所聞見者也。凡諸無據如自上申報以弋虛名，詭設同文館以徼物聽等事，尚不足以折司馬之心，姑不說，請即僕等所躬被者論之，一營務處常事耳，南北兩洋漕河，沿海道府州縣，往往有營務處之名也，僕等與司馬雖非舊識，要是貧賤之交，而往春初見，雖謂作公孫子陽見馬文

淵之狀，一再規諷，不少愧悔，此一可笑。嘗今昔猶是一人耳，而老師先生某翁某兄之稱，愈變愈奇，不解其故，此二可笑也。營司彼公支應所，司馬既有領款，應具領結，營因司馬問領結格式，遵即開寫，輒斥為何物支應所，敢爾誕妄，不知所謂誕妄者何在，勿論公事矣，營於司馬平昔交情何如，而出此面孔，此三可笑。顧此猶尋常世態也，司馬今貴人，不足以為輕重，更即有關於司馬品行術者論之，司馬所謂營務處，分統三營之營務處也，會辦朝鮮防務，孝亭會辦也，公牘具在，文理昭然，而司馬札封稱欽差北洋大臣會辦朝鮮防務總理營務處，將不屑於此間欺，則不應受事，將以此愚瞽東人欺，則東人不盡無知，將竊借北洋以欺人欺，則人不可欺，言官劾左寶貴者，列其妄稱欽差欽命字樣，不知司馬此舉與左寶貴何異，此其一。營務處是差事，而官則同知五品耳，於鎮將用札，於州縣用札，而上之，將道員兼營務處者，於實缺提鎮亦當用札耶，在司馬之意，豈不謂關防頒自北洋，便用北洋體制，彼州縣檢簿之印，無不頒自禮部，將亦與禮部一體耶，事例乖謬，此其一。既為孝亭會辦，同見國王，便當孝亭居左，一應公事，便當會孝亭前銜，而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陵蔑一切，致使將領寒心，士卒怨涕，司馬將謂勢力可以攝人，權詐可以處事耶，不學無術，此其一。內地職官，惟實缺出則張蓋，若營務處營官，從未見有用之者，乾嘉間冊使東臨，國王迓以肩輿，曾被詔旨申飭，事載朝鮮大事考例，而司馬居然乘輿張蓋，製五色馬旂，呵殿出入

平時建兵船黃龍大旗，不知自處何地，置孝亭何地，置國家體制於何地也，此其一。副營是彼公三十載坐營，方撤司馬接管之日，歛歔嗟嘆，偏謂賓僚，慰亭是三世交情，吾所識拔，必不負吾，必不改吾章程，而司馬接管後，初次來函，便較論海防教練各費，吞吐其辭，意謂彼公會藉以冒領浮支，使之警覺恐懼乎，不知海防費二千兩，金州朝鮮各得其半，係有明文，教練費早於去冬十月截止，鼎鑪有耳，豈不聞之，且彼公故人舊部，從者實多，用度日絀，而其津貼司馬動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馬到營之始，僕役口糧，亦照差官發給，今恩誼所在略不顧，義利之辨略不省，此其一。彼公以副營昇司馬，有舉賢自代衣鉢相傳之意，受人知者，雖其人之事一物，亦須顧惜，而司馬自矜家世，軋譁謂是區區何足奇，便統此六營，亦玷先人，夫子孫當思祖父所以榮當時，而福後人者，兢業以紹其休，不應陷君家公路本初四世三公之陋說，且由司馬之說，則令叔祖端敏公令堂叔文誠公進士也，尊公及令堂叔子九觀察舉人也，司馬何以並不能博一秀才，玷有先於此大於此者，何不此之恥，而漫為夸說，使人轉笑彼公付託之非，易一人而如此焉，司馬謂其尚有良心乎，此其一。販烟有誅，宿娼有禁，司馬所曾律以殺人刑人者，而烟膏鸞自三軍，府則容之，官妓三名，聚宿三軍，府則躬與之，不知何以對所殺所刑之人而無愧，此其一。教練新建營會辦朝鮮防務，司馬所得預者，軍事耳，此外朝鮮一切政事，豈應越俎，而尹泰駿之被擄歸第，李祖淵之解去兵符，司馬公然為

關說，張敬夫所購湖桑，必不值二萬四千金，此中弊竇，人人所曉，司馬公然為之主持，司馬今日方謂憑我一言，何事不辦，以此自鳴得意，雅不顧有識之嗤於其後，此其一。彼公於北洋三十餘年之舊部也，孝亭亦三十餘年之舊部。司馬於北洋輾轉因緣而竊承其呼吸者，數年餘耳，司馬嘗為僕等說李某忌文誠公先公事，憤恨不已，今何以裁得其一札，公牘私函便一則曰稟北洋，再則曰稟北洋，豈昔所謂怨者，今已修好耶，抑挾北洋之虛聲以籠罩一切耶，抑前所云者，不過因李某方冒天下之不韙，而姑假此說以附清議之末焉，是皆不可，況北洋未必盡吞噬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未必盡如司馬之飯心委命於北洋，不然，愚人而徒自露其先，後不倖之跡，此其一。茅少笙紀雨農之二人者，司馬曾親為僕等言其輕躁貪鄙販貨挾妓之狀，且述二人酗酒辱罵彼公語，斥其病狂喪心，當時意司馬誠知人，誠然於彼公有昔賢待府主之義，今何以此而唾之，所聞司馬之議論，且如出茅紀二人之口，此其一。僕等與司馬相識，今三年矣，以司馬往日之為人，疑其不應如此，以司馬今日之行事，恐其不止如此，試為溯其源，則司馬胸中恃家世，又謂二十許人作營務處管官，姓名見知於一新辦洋務之宰相，是曠古未有之事，又有虛憍者浮檢者圓熟者庸惡陋劣者左之右之，頌功述德，務求合乎司馬之所樂，而司馬亦遂志得意滿，趾高氣揚，而不顧陷於不義，試為窮其流，則司馬既與尹泰駿等換帖矣，必益聯絡朝鮮之中使外務衙門，張皇體面，高掌遠矚，使孝亭不安而退，必用兼並之術，

揚此抑彼，輕此重彼，使彼公舊人互相不安而退，必借北洋以干預朝鮮一切用人行政之權，必交歡閔氏，俾國王專奏力薦，希攬防務商務之柄，必以取重於國王者，因取重於北洋，希作海關道，凡此之說，未免近於逆臆，然欲撤總兵劉朝貴為提調，分明是開標，分明是制郭春華，是何禮制，而飭其詞曰以符體制，此次國王來函，無一不稱曰袁會辦，而孝亭轉似在牽連得書之例，此得謂非司馬之心思力量手眼之所構耶。今僕等於司馬隔若秦越，亦何樂曉曉，竊念當時交誼，實不忍徒引闖於知人之咎，而坐視其沉迷，故痛切言之冀大聲疾呼以寤司馬，或者謂司馬見此訊必大怒大罵，必有人助司馬大怒大罵，必來見彼公辭差，必以訊併入浮言之例，袁稟北洋，以箚將來之口，而益堅北洋之信，或謂司馬雖大怒大罵，然必故事含宏，謙詞謝過，指天誓日以明無他，是二者意司馬必不出此，亦不必出此，司馬誠試思所說有虛者否，有不是者否，願司馬息心靜氣，一月不出門，將前勸讀之呻吟語，近思錄，格言聯璧諸書，字字細看，事事引鏡，勿謂天下人皆愚，勿謂天下皆弱，腳踏實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彼公之知遇，則一切吉祥善事隨其後矣，此訊不照平日稱而稱司馬，司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復三年前之面目，自當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氣與詞涌，不親刺刺，聽不聽司馬其自酌之。

袁得信後，忍耐含容，未作答辯，但不通問候者，幾將十年。直至甲午，中日戰起，袁自韓奉調歸國，而張適于是年以一甲一名進士及第，

供職翰林院。袁遂專誠往訪，執禮甚恭，長談三小時之久。時袁陰懷政治野心，鑒于當日朝中人才，實無後起之秀，目的要先打倒李鴻章，然後徐圖與援，取而代之，默認張氏有可利用之處，遂歷述十年來在韓受李種種壓迫，及此次亂事再起，曾密電條呈數十次之多，均不採納，致肇戰爭，有誤大局，引起張氏舊日傷感，故在彈劾李氏文中，兩提袁氏之名，無形中為袁捧場，不知不覺中又助袁倒李，袁氏聲望，因大增進。

民國二年十月六日袁氏被參眾兩院公舉為正式大總統，並正式組閣，以熊希齡為第一內閣總理，張先生曾一度被邀出任工商兼農林兩部總長。閣員中以先生與梁啟超二人完全為書生本色。先生對工商農林，本有一番抱負，尤以導淮水利更為其數十年來中心思想之所屬。在就職不到一月，即與美國公使磋商借款以導淮，美使亦極表贊同，竭力周旋，在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二月初，且進一步與美國使館簽訂導淮借款草約，可惜簽約後十天，熊閣以財政無法支持，提出辭職。照責任內閣制，所有全體閣員應共進退，但獨張氏流連不去，在其年譜中，有下列一段記載：

『楊士琦來問閣員與總理共進退之說，余曰始來以府院並有連電之約，就職之日，即當眾宣言，余無仕宦之志，此來不為總理，不為總統，為自己志願。志願如何？即本平昔所讀之書，與向來研究之事，試效于政事。志願能達到則留，不能達到則去，不因人也。』其實張氏內心不辭，最大原因，即為導淮借款合同，如去勢必擱淺。袁氏知其隱衷，借此即將導淮總局改為全國水利局

，派張兼任總裁。未幾，第一次歐戰爆發，美國聲明所簽導淮借款合同不能履行，而袁氏帝制行動，亦日趨積極，且已明朗化。民國四年，籌安會成立前夕，張氏最後一次進府，力勸袁氏，勉為中國第一任華盛頓，不要做法國上斷頭臺的路易，袁氏矢口否認，當面說謊，但云美國人古德諾建議共和政體不合中國，却有討論研究之價值云云。張氏心意已堅，遂決意離京，請假南旋，于是袁氏叛國稱帝的謀畫，更肆無忌憚，暴露無遺，在封王賞爵之時，特頒贈『嵩山四友』榮譽到通，南通博物院中尚存有此『嵩山圖本』作為洪憲稱帝的紀念品，張氏凜于民國國本之搖動，及帝制萬無成功之可能，本君子愛人以德之本意，再從南通，進一最後忠告，託當日所謂國務卿徐世昌轉達，可謂仁至義盡矣。」

函中所稱司馬，所指即為袁世凱，略含諷刺意味。一則周制司馬為六卿之一，職掌軍政。二則後世俗稱同知為司馬，因為袁世凱的出身是他嗣父幕客津關道周馥花錢給他捐納的一名同知。彼公係指吳長慶，由於吳長慶字筱軒，東事則指朝鮮之事。

是年袁世凱接到這一封揭盡其短，把他罵得狗血噴頭的長信。由於事實俱在，辯也無益，祇好隱忍不發，把一口惡氣深埋心底。自效而後，袁世凱依附李鴻章，飛黃騰達，青雲直上，張睿則仍為窮書生如故。雙方不通音問，達十一年之久。詎料張睿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張睿掄元，大魁天下。袁世凱則正以棄守朝鮮，俱不同任，相傳曾遭

李鴻章怒而擱之。他在京津之間栖栖皇皇，不知所之。這才想起他的狀元老師，專誠拜謁，執弟子之禮。與張睿長談歷三小時之久，他跟張睿澄清了十一年前的「誤會」，又傾訴在朝鮮十一年間如何忍受李鴻章的頤指氣使，欺凌壓迫。更說是年東學黨亂起，李是應被戕，他又如何根據張睿的朝鮮善後六策，十餘次密電條陳，而李鴻章終不採納，以至導引甲午之戰，貽誤大局。張睿當年終究是性情中人的「一介書生，袁世凱投其所好，他便又次中了袁世凱的蠱惑。不但前嫌盡棄，尤且在他那年彈劾李鴻章的奏疏中，一再揄揚袁世凱。首則謂：「不知本年五月間，日蹙已見三條約，詰以派兵何不先行知照，則日謀可伐，不至於戰，而李鴻章以昏惰敗之。」繼而又曰：「朝鮮弊政，本應中國早為酌改，日既以是為詞，我何妨令袁世凱與議。」這兩段話，關係重大。張睿既盛責李鴻章為天下人所唾罵，又迭稱李鴻章由於不用袁世凱之謀，不令袁世凱與議而導致中日甲午之戰，一敗塗地。彷彿朝鮮問題，中日之爭，要求得解決，非重用袁世凱不可。由而將袁世凱的幹練有為置於李鴻章之上。張睿彈劾李鴻章敗壞和局，普受朝野之士重視讚揚，袁世凱的名望隨之扶搖直上，簡在帝心，張睿則又一次做了袁世凱的墊脚石。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
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
即可收到書刊。